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 研究（1931～1945）

A Study of the Japanese Newspapers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1931～1945)

孙继强◎著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 研究(1931~1945)

A Study of the Japanese Newspapers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1931~1945)

孙继强◎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 1931~1945 / 孙继强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117-2155-6

I. ①侵… II. ①孙… III. ①报业—研究—日本—1931~1945

IV. ①G219.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3317 号

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 1931~1945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谈

责任编辑: 王琳

责任印制: 尹明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1(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5(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388 千字

印张: 23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5.00 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从1945年9月11日起，登陆日本本土的盟军总部在三个月内先后四次发布战犯逮捕令，被指名的甲级战犯共有118人，知名报界人士正力松太郎（《读卖新闻》社长）、德富苏峰（战时日本新闻界最大的团体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绪方竹虎（《朝日新闻》副社长、主笔）等人名列其中。舞文弄墨的文人入得盟军追究战犯的法眼，是战时日本报界为对外侵略战争推波助澜的最好注脚。

1870年12月8日，《横滨每日新闻》问世，宣告了日本近代传媒黎明期的到来。此后日本报业发展迅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垄断时代。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矛盾加剧，法西斯思潮开始抬头并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军部渗透，暗杀和政变成为右翼分子表达政治诉求的手段，“二·二六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的国家政治运作完全被军部绑架。政治生态的变换及国际局势的变动，使得舆论空间日渐紧缩，日本报业亦逐渐背离了舆论的批判和监督功能，最终发生“转向”，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吹鼓手”。

日本报业法西斯化的过程也是日本战时传播网络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是传播源制造并发出信息，传播者选择加工信息并通过某种渠道传递给受传者并引起反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构建传播路径方能达到传播目的是战时传播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涵。

战时日本政府的传播诉求主要集中于政策传播。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传达给民众，使民众理解并获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得以顺利推行。尤其是在“总体战”的战争理念下，要想把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宣传工具而仅靠武力推行是行不通的。鉴于此，日本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手段和制度手段将大众媒体牢牢控制，其目的是借助媒体的强大宣传力将政策传达于民众。而要达到上述目的，还需要借助媒体对政府出台的法令、法规、政策进行剖析、解读，挖掘出“新闻背

后的新闻”，以便让受众完全了解并接受。而政策传播的归着点并非止步于此，在民众充分了解政策的基础上，以政府意愿为目标进行特定引导，并对受众的思想或者行为产生特定的影响，使之完全按照政府的意图行事，方完成政府所期待的宣传任务。

在上述战时传播过程中，至少涵盖了传播主体（政府）、传播渠道（媒介）、传播客体（受众）三个要素。而日本战时传播的构建路径即是围绕这三个要素展开的。

首先，为保障对传播渠道的有效控制，掌握话语权，作为传播主体的日本政府利用其自身掌握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根据“总力战”推行的需要，千方百计地加强对新闻报道的管制，压缩言论自由的空间，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制定言论统制法令、法规，完善言论统制机构。同时，政府通过控制信息来源等方式来控制媒体。媒体希望从政府获得相关信息，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赖权力机构的帮助。战时记者想通过采访来获得准确、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十分困难，因而往往更多的是从交战国的政府或军方的新闻发布会获得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报道就落入了权力设置的陷阱。如果有媒体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获得信息或者发布令政府不满的信息，政府可以通过剥夺其从政府和军方获得资料的权利来压制。

其次，是否能够完成政府的传播期许取决于媒介的宣传姿态和配合程度。决定战时日本传播媒介价值取舍的除了客观的政治条件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主观因素和经济利益等条件。可以说媒体的参与既是政府的被动诉求，也是媒体本身的主动诉求。在这种双重诉求的捆绑下，媒体自然会主动站在政府军队的一边，力求使自己的报道对自己的国家和军队有利，并且有助于提高国民士气，激发国民同仇敌忾的情绪。换言之，媒体在面对战争时，其自身的选择是决定其报道姿态和舆论导向的根本因素。以战时体制下日本报界而言，尽管有政府权力的压制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但报社记者作为国民中的个体，自然也难以避免举国上下的“爱国主义”氛围的支配，而从报社整体来讲，经济实力的强弱决定了报社在激烈竞争中的发展趋向。因此自身盲从式的“爱国主义”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是媒体参与传播网络构建的主导性内因。物质上的商业利益和精神上的国家主义促使日本媒体主动按照政府诉求参与战争宣传，从而完成了自下而上的构建。

第三，受众也是推动战时传播网络构建的主体之一。虽然媒体通过设置话题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但是公众舆论也可通过诸如公共情绪等非

正式渠道反作用于媒体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是传媒的顾客，传媒在向公众进行宣传的时候，必须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这里所说的“接受能力”除了受众的身体状况和文化水平之外，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受众所处的环境。如果媒体的论调与受众的接受能力背道而驰，必然会遭到受众的抛弃。而受众对媒体的抛弃，必然造成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力受损，这是媒体所不能承受的。比如战时在日本民众的排外主义和战争狂热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国民的爱国热情越高涨，报纸就越会被读者的要求和周围的局势所影响，自然无论是言论还是报道都会趋向国家主义化和帝国主义化”。换言之，政府借助传播网络营造了一个狂热的战争环境，而处于这个战争环境中的受众则反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战争环境，进而促进了传播网络的日臻完善。

总之，战时日本政府话语权的构建是政治网络的构建和政治传播的结果，而政治网络的构建和政治传播的实施又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政府话语权的构建。在这个矛盾统一体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和作为基层组织的媒体又是缺一不可的，二者构成的传播网络不但保障了政治传播的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政治传播的原则、性质和效果。

考察日本报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与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在日本国内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政治生态中借势发展、壮大，也因此而被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最终走上了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道路。

本书是孙继强同志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作者利用大量文献资料，经过自己的梳理和归纳，系统、全面地考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报界的生态，提出了一些创新性观点。

首先，从传媒与战争的关系角度出发，厘清了战时日本报界的发展脉络，勾勒了日本报界由抗争到妥协、最终沦落为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考察了战时日本媒体“转向”的原因。

其次，从政府、民众和媒体三方面考察了战时话语权构筑过程中日本传播网络的构建过程，指出战时报界话语权的构筑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政府利用其掌握的政治资源为报界编织了一个法西斯化的生存环境，而处于该生存环境中的受众诉求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生存环境，进而加速了报界法西斯化的进程，同时报界自身“爱国主义”盲从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是其走向法西斯化的主导性内因。

第三，日本报界与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战时日本的社会思潮引领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方向，而对华政策又在极力迎合甚嚣尘上的军国主义极右思潮。报界作为社会思潮的载体，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本书是我国首部以战时日本报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它尝试从新闻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日本的侵华战争，从而进一步剖析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因素显得日益重要。大众传媒不但是认知国际关系的风向标，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对传媒的引导和利用也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此背景下对战时日本报界进行研究，则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名初涉日本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撰写的专著，本书还有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之处。如对战时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以及战时被占领区的日本报界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对日本报界积极支持战争原因的分析似不够充分，读完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作者还年轻，相信在学界同仁的指导下，会励精图治，不断进步。期待着作者在今后漫长的治学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取得新的成就。

李卓

2014年3月于南开园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序	1
导 言	1
一、研究对象	2
二、研究现状	7
三、研究意义	14
第一章 战前日本报界发展概况	19
第一节 日本近代报业诞生的背景	19
一、外来文化的影响	20
二、社会条件的促进	26
三、政治发展的推动	29
第二节 日本近代报业报道方针的演变	32
一、时政性报道方针的确立	32
二、“小报”的产生与发展	38
三、社会主义者创办的报纸	42
第三节 日本近代报业经营方针的变革	43
一、报道本位主义的确立	44
二、营利主义路线的确立	46
三、报业经营方针的完善	48
第四节 日本报界的生存环境	51
一、“明治维新”时期宽松的办报环境	51
二、“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业的统制政策	54
三、“政党政治”时期的两面政策	61
四、战前报纸的反体制运动	66

第二章 战时日本报界的发展（1931~1945）	74
第一节 战时传播网络的构建	75
一、言论立法构建战时传播的生存环境	75
二、机构设置催生战时传播的管理主体	83
三、报界参与完善战时传播的结构内涵	90
第二节 战时日本报界的“转向”	102
一、“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报界	102
二、“九·一八事变”后报界的“转向”	107
三、难能可贵的反战言论——《赤旗》	112
四、报界战时体制的确立	119
第三节 战时体制下的新闻团体	127
一、同盟通信社	127
二、日本新闻联盟	138
三、“满洲国通信社”与“满洲弘报协会”	142
第三章 战时日本报界的政策传播	148
第一节 报界的“满蒙政策”报道及实践	149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报界的“满蒙政策观”	149
二、对“满洲国建国”的报道	155
三、对“满洲移民”的报道	157
四、对国际联盟“满蒙决议”的报道	161
第二节 报界与战时思想统治	165
一、对思想统制事件的报道	166
二、对法西斯恐怖事件的报道	171
三、战时报界言论镇压事件	178
第三节 报界的“大政翼赞体制”报道	183
一、赞“大政翼赞体制”的发端	183
二、助“大政翼赞体制”成长	185
三、挽“大政翼赞体制”败局	188
第四章 战时日本报界的战争宣传	191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战争宣传	192
一、歪曲报道事变原因	192

二、大肆渲染“爆弹三勇士”	196
三、不遗余力的宣传攻势	199
第二节 全面战争时期的宣传活动	203
一、颠倒黑白的“卢沟桥事变”报道	203
二、南京沦陷前后的新闻报道	207
三、支持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	212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报道	216
一、战略进攻时期的陶醉式报道	216
二、战略防守时期的欺骗性报道	220
三、战略溃败时期的虚假性报道	224
第五章 战时日本报界的后方动员	
——以“国家总动员”为中心	228
第一节 国家总动员体制	228
一、国家总动员计划	229
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展开	231
三、国家总动员的作用	234
第二节 国家总动员的急先锋	235
一、粉饰《国家总动员法》	235
二、大力宣传“精动”	237
三、全力落实“物动”	241
第三节 致力于后方国民动员	244
一、国民征用	244
二、女子挺身队	247
三、学生动员	251
第四节 无所不至的新闻触角	256
一、极端的“奉公”报道	257
二、派遣“笔部队”，塑造战争文学	263
三、力倡结婚报国和生育报国	266
第六章 战时日本新闻人物研究	270
第一节 战时情报组织的主宰者——绪方竹虎	271
一、报社记者时期	271
二、《朝日新闻》“笔政”时期	275

三、情报局总裁时代	284
第二节 德富苏峰与大日本言论报国会	290
一、德富苏峰的报业实践	290
二、大日本言论报国会	297
三、德富苏峰的“言论报国”	303
第三节 战时报界的反抗者	308
一、菊竹淳	308
二、桐生悠悠	313
三、其他	316
终 章	320
一、战时日本传播网络的构建	320
二、战时日本报界的作用	322
三、战时日本报界的特征	325
四、日本报界纳入战时体制的原因	333
五、新闻专业主义与政治的冲突	341
参考书目	345
中文书目	345
日文报刊	347
日文书目	348
后 记	355

图表目录

图 1-1	遭受处罚的报纸统计图 (1878 ~ 1881)	61
图 2-1	情报局职员配置及系统图	85
图 2-2	同盟东亚通信网络图	136
图 2-3	1942 年“国通社”东亚通信网略图	144
图 5-1	《朝日新闻》慰问金和防空捐款 累计表 (1931 年 10 月 ~ 1932 年 10 月)	260
表 1-1	1868 年创办于江户的报纸一览表	29
表 1-2	政党性报纸及其所属政党一览表	37
表 1-3	“政论性”报纸与“小报”的区别	39
表 1-4	报纸发行量的增长情况一览表 (1876 ~ 1877)	41
表 1-5	对报纸及出版物的行政处分件数	65
表 1-6	对报纸及出版物的司法处分件数	65
表 2-1	“九·一八事变”前后报纸杂志受处分一览表	77
表 2-2	报纸、出版物等受行政处分情况 统计表 (1936 ~ 1940)	80
表 2-3	战时普通日刊报纸 整合状况 (截至 1942 年 11 月 1 日)	95
表 2-4	东京、大阪及全国报纸广告行数的 变化 (1936 ~ 1941)	98
表 2-5	联合经营前后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101
表 2-6	同盟通信社“助成金”占总经费的比例	132
表 2-7	伪满弘报协会兼并收买报纸情况	146
表 4-1	《大阪每日新闻》印刷设备增长一览表	200
表 5-1	战时日本的劳务动员状况	246

表 5-2	日本内地学徒动员数量 (1944 ~ 1945)	255
表 5-3	各报社、杂志社派遣文学家一览表	264
表 7-1	战时《朝日新闻》日均发行量的变化	336
表 7-2	昭和时期日本主要报纸发行量的变迁	338

导 言

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新政府大力推行“脱亚入欧”政策，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由此踏上了近代化的道路。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社会矛盾开始凸显，比如明治初期的民众叛乱、西南战争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等，都对明治新政府的统治基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明治政府内部出现分化，一部分政治势力提出“将冀希内乱之心转移于外，乃为兴国之远略”^①的对外侵略主张，试图通过对外侵略来消除国内矛盾和危机。此后随着日本国力的逐渐增强，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大力充实兵备，布国威于海外”的战略思想成为日本近代对外关系的一条主线。

外侵战略并非仅仅停留在政客的政治主张和文人的著书立说上，一旦条件成熟，这种对外侵略的主张便被付诸实践。1874年日本以“琉球贡船事件”^②为借口出兵台湾，并于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王国。与此同时，日本也加紧了对朝鲜侵略的步伐，于1875年挑起“江华岛事件”^③出兵朝鲜，进而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特权^④。然而日本并不满足于对台湾和朝鲜的侵略，随着外侵野心的不断膨胀，日本把触角伸向觊觎已久的中国大陆和俄国，到后来终于发展为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两次战争不但实现了日本产业革命所必需的资本积累，使其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同时也是日本此阶段试图染指海外的外交政策

① 具体参见渡边几治郎：《日本战时外交史话》，千仓书房，1937年，第27~30页。

② 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人乘船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登陆，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其他人被清政府送回国。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向清政府发难，乘机出兵武力侵略台湾。

③ 1875年9月20日，日本军舰侵入朝鲜领海，在位于朝鲜首府汉城不远的江华岛测量海口，朝鲜炮台开炮示警，日舰“云扬号”便以此为借口攻毁炮台，日军登陆，屠杀朝鲜军民，此后便强迫朝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约》，史称“江华岛事件”，亦称“云扬号事件”。

④ 关于日本出兵朝鲜和台湾、琉球的经过及政策决策过程，请参阅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章的相关内容。

的具体行动选择。

然而，在这个耀眼的光环背后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以“极东宪兵”自居的日本正在一步一步向帝国主义的深渊滑落。1914年日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挑起了侵华战争，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41年对英美宣战，扩大为太平洋战争，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对外战争的规模以日本人从未经历过的速度急速升级。在这个过程中“神国思想”贯穿始终，成为日本推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从某种意义上说，昭和时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悲剧已经在明治时期埋下了种子。

一、研究对象

战后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主导下，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但由于对战争的反省和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够彻底，使得肯定“大东亚战争”的逆流死灰复燃并呈愈演愈烈之势。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重演，奠定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大局，中日史学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对侵华战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然而在这些硕果累累的研究中，对战时传媒的研究则显得极为滞后。

传媒（media）是指以报刊、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网络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的总称。传媒具有物质和精神的混合特性，物质形态是外壳，精神形态是内核，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①传媒的社会功能主要有四点：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鉴于传媒的监督功能，有很多人将传媒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

就日本来讲，日本的近代传媒始于明治时期。日本第一份日报《横滨每日新闻》的问世宣告了日本近代传媒黎明期的到来，随后日本报业伴随着日本近代化的历程得以迅猛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报业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925年3月22日，社团法人东京广播电台在位于东京芝浦的东京高等工艺学校的新建图书馆内的临时播音室里，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播音，广播作为新的媒体形式登上了日本的历史舞台。然而，战时日本最重要的媒体依然是报纸。历经多次改革以及历次战争的洗礼，日本报业的规模获得了较大发展，其经营

^① 李宏、李民等：《传媒政治》，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理念和办报方针日渐趋于成熟。此外报纸具有无需专用设备、便于携带、便于阅读、直观性强、阅读成本低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便于保存等优点，再加上日本社会教育普及程度较高、日本报业有意识培养读者层等特点，使得报纸在面临广播的冲击时，依然保持了强势媒体的地位，在战时传播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优势。

战时日本报界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最终由视自由、公正为从业准则的社会公器沦落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可以说，这个过程是日本报界逐渐丧失其应有的批判和监督功能的过程，是日本报界参与战争、宣传战争、推动战争发展的过程，是日本报界对强权政治屈服、迎合和协力的过程，它对形成全民总动员的“总力战”体制、煽动战争狂热和排外主义风潮、推动侵略战争进程的发展起着“军部想发挥却发挥不了”的作用。可以说，以日本报界为代表的舆论界和军部是推动战争发展的两大动力，军部依靠武力掠夺他国大量土地和资源，并对他国人民实施殖民统治和屠杀，而报纸则依靠其传播功能为塑造全民精神总动员、构筑战时精神、统一国民思想、推动战时体制的建立发挥了难以取代的作用。因此战时日本报界颇具研究价值，是学界深化研究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所必须重视的重要课题。

下面对本书的研究对象以及所涉及的几个概念作一简单界定。

1. 战时体制

本书所提及的“战时”是指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这一历史时期，也即学界所谓的“十五年战争”^①时期。而与之相对应，“战前”则指的是“十五年战争”之前，即1931年9月18日之前的历史时期。为行文方便，本书按照战时报界的发展脉络和报道姿态，将日本报界在战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来加以分析。

第一阶段（1931~1936）从“九·一八事变”到“二·二六事件”，是中日两国局部战争时期，也是日本报界由抵抗走向妥协的时期。在该时期，日本报界的报道态度发生了“转向”，逐渐放弃原先的反军、反战主张，开始对军部的行为给予支持，但是该时期内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① “十五年战争”的提法最早是由日本学者鹤见俊辅于1956年提出的。鹤见认为“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日中事变（即“七七事变”）以及大东亚战争开始的消息是零零散散地传过来的，因此主观上容易认为都是些个别的战斗行为”，“而这些战争事实上是互相联系的”。因此他把这段时间统称为“十五年战争”。具体参见鹤见俊辅：《战时日本精神史——1931~1945》，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第240~241页。